

浙江长兴梅栽培历史研究

周 巍¹, 王小德¹, 吴晓红², 周小洁¹, 周 琦¹

(1. 浙江林学院 园林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2. 浙江长兴东方梅园有限公司, 浙江 长兴 313100)

摘要: 为展现浙江省长兴县梅 *Prunus mume* 栽培发展的历史面貌, 通过浏览当地方志文献, 考究文人墨客的诗词画迹, 对长兴县植梅历史轨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研究表明, 长兴县梅的栽培起源于唐朝, 以栽培果梅为主, 在宋、元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初至清末是其昌盛期, 栽植规模达数十万株之多, 但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清末逐渐衰败, 栽植面积不足 1 hm²。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恢复, 包括果梅、乌梅、花梅等在内的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07 年全县仅花梅面积就达 400 hm²。长兴县梅的栽培历史与规模, 可与中国其他任何传统产梅地区相媲美, 在梅栽培史、梅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学地位。参 15

关键词: 经济林学; 梅; 栽培历史; 长兴

中图分类号: S662.4; S75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692(2009)02-0252-05

Cultivation history of *Prunus mume* in Changxi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ZHOU Wei¹, WANG Xiao-de¹, WU Xiao-hong², ZHOU Xiao-jie¹, ZHOU Qi¹

(1.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Lin'an 311300, Zhejiang, China;

2. Zhejiang Changxing Oriental Plum Garden Co. Ltd., Changxing 3131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history of *Prunus mume* (Mei) in Changxing, the historical tracks of planting Mei wa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by reviewing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studying the paintings and poetries about Mei.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Mei cultivation in Changxing started in Tang Dynasty and mainly the fruit Mei, it was further develop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ere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the number of Mei reached as many as 100 000. Due to the destruction by wars and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the cultivation of Mei declined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cultivation area was less than 1 hm². Since 1980s, Mei industry including fruit Mei, flower Mei, and fuctus Mei, resumed gradually and achieved a great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the area of flower Mei reached 400 hm² in 2007. The history and the scale of Mei cultivation in Changxing are comparable with all the other traditional production areas. I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history of Mei cultivation and culture. [Ch, 15 ref.]

Key words: cash forestry; *Prunus mume* (Mei); cultivation history; Changxing County

长兴县位于浙江省北部, 与浙江湖州的安吉县、吴兴区和安徽的广德县、江苏的宜兴市接壤, 30°11' ~ 30°43'N, 119°33' ~ 120°06'E。长兴县春秋时属吴, 吴王阖闾使弟夫概筑城于此, 城狭长, 故名长城, 至今已有 2 400 a 以上的历史。晋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建长城县,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改长城县为长兴县^[1]。长兴是南北朝时期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故乡, 唐朝茶圣陆羽在长兴

收稿日期: 2008-05-29; 修回日期: 2008-11-06

基金项目: 浙江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06C12061); 浙江林学院人才培养基金资助项目(2006FR007)

作者简介: 周巍, 从事园林植物应用与效益评估研究。E-mail: sunnyzw42@163.com。通信作者: 王小德, 教授,

博士, 从事生态园林、园林植物引种与应用研究。E-mail: wxd65@zjfc.edu.cn

顾渚山写就了《茶经》，顾渚山的紫笋茶被奉为了唐朝贡茶^[1]。长兴县梅 *Prunus mume* 的栽培历史同样十分悠久，其果梅、乌梅、花梅产品在全国久负盛名，是“中国红梅之乡”和“浙江省青梅之乡”，2007 年全县仅花梅种植面积就达 400 hm²。由于目前尚未有关于长兴梅栽培历史较为科学系统的报道，近年来媒体发布的信息也有失科学性和翔实性，因此，通过历览当地方志文献，并考究同时期文人墨客的诗词画迹，开展长兴梅栽培历史研究，对深刻挖掘长兴梅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梅栽培发展的历史面貌^[2-3]，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促进现代梅产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长兴植梅历史轨迹

梅原产于中国，有 7 000 多年的梅子应用历史和 3 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4-5]。作为隶属于中国野梅自然分布区内的浙江长兴，其梅的栽培历史与全国宏观意义上的植梅历史轨迹基本相同，大致的发展路线是“野生自然分布→采食利用→果用栽培→观赏栽培”，相继经历了“初始期、兴盛期、昌盛期、衰败期、转折与发展期”等阶段^[2,6-7]。

由于果梅突出的经济价值，在历史上对长兴梅农的经济生活起到过积极作用，因而，在其漫长的植梅历史中，基本以栽培果梅为主体。长兴的花梅直到进入 21 世纪后，才真正意义上作为主要栽培目的进行大量产业化栽植。从观赏角度上看，历史上长兴的果梅尤其是大规模片植的果梅，在其花期亦达到了花梅的景观效果，吸引了诸如杜牧等诗人著以诗歌之。

2 长兴梅的野生分布、采食利用阶段

长兴县野生梅的自然分布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吴国时期。据《长兴地名志》记载：“又传春秋吴王阖闾时，有白鹿含红梅见于岩山，亦名白鹿山。”岩山位于长兴县城西约 20 km 处，海拔为 525 m。虽然这一文献记载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但鉴于当时良好的生态环境，远在春秋吴国时期的长兴，白鹿 *Cervus nippon* 及白鹿嘴含红梅现象的存在较为合乎情理，此时长兴的梅还处于野生自然分布状态。

据文献考证，长兴野梅的采食利用阶段大致开始于西汉时期。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证需从长兴古代的名酒“箬下春”说起。箬下春，史称“乌程箬下”，又名“翠水”“十月白”“细花烧酒”“福桔酒”等。据《吴兴杂录》记载：“汉梁孝王兔园会，招文士邹阳、司马相如之徒，赋乌乡酒。”说的是梁孝王举行盛大酒会（时称“兔园会”）时，就命一代名士邹阳、司马相如作赋赞颂箬下酒。这里所提及的梁孝王即为汉文帝刘恒之子刘武，公元前 178 年被立为代王，公元前 168 年迁为梁王。以此文献看，早在西汉时期，长兴的“箬下春”酒就已风靡一时了，而长兴梅采食利用阶段开始于西汉的观点与“箬下春”酿造的原材料有关。《长兴县志》记载：“箬下三白，投香药不下数十种，而以福桔、头二蚕沙、梅花、松节为佳品。”由此可知，梅花是酿造“箬下春”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因此，可以推断，西汉时梅已被长兴民间作为酿酒原料进行了采食利用，而这也与中国梅的栽培历史发展规律相吻合。

虽然将西汉作为长兴梅的采食利用开始阶段是经过文献综合研究后从侧面推断得出的，缺乏确凿的文字材料作为直接论据，但必须承认的是，整个江南地区是传统梅产区^[8]，正如唐朝诗人罗邺所说：“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作为地处太湖之滨吴越文化重要发源地的长兴，无论自然生长，还是山农栽植，其梅的历史必定悠久。

3 长兴梅栽培的初始期

从梅的野生分布、采食利用阶段发展而来，长兴梅进入了栽培阶段，但对于具体的植物生长和栽培史来说，要落实一个历史起点实属不易^[9]。长兴梅的栽培起源于何时？近年来，网络信息多将它笼统地定义为 1 200 多年前或 1 000 多年前，缺乏科学依据。而遍检早期吴兴郡文献及长兴县志可以推断唐朝为长兴梅栽培的初始期。

文献研究表明，长兴梅栽培起源于唐朝的考究与长兴顾渚山著名的紫笋茶有密切关系。众所周

知, 顾渚山是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 曾是陆羽研究茶道并修著《茶经》的主要场所, 而产于顾渚山的紫笋茶, 则是唐代的贡茶。

时任湖州刺史的唐代诗人杜牧, 在顾渚山主持初春茶区“喊山、拜泉”民俗时, 有《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员外》一诗留世: “雪涨前溪水, 啼声已绕滩。梅衰未减态, 春嫩不禁寒。”诗中字里行间表达了长兴初春时期栽植在茶旁溪畔的梅树繁花败谢、而春茶吐芽的景象。杜牧在顾渚山期间所作的《茶山诗》: “舞袖岚侵润, 歌声谷答回。磬音藏叶鸟, 雪艳点浑梅。”诗中亦流露出了当时长兴已栽植有梅的重要信息。

此外, 唐代长兴茶人在农历正月初七有“人日望春”的习惯, 而梅则被当时的人们喻为报春使者。晚唐时期, 在长兴白岷洞山课章艺茶的卢仝, 写了咏梅诗《人日立春》: “春度春归无限春, 今朝方始觉成人。从今克己应犹及, 颜与梅花俱自新。”由此可知, 在当时长兴的梅已与人们的风土民俗密切相连, 并赋予了梅传春讯、梅开五福的象征意义, 成为了当地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中国梅栽培的历史规律, 参考隋唐时期梅栽培历史的进程, 可以推断: 长兴的梅在唐代能够被人们付诸深刻的精神内涵和象征意义, 进而成为当地风俗的组成部分, 它必定已开始从“野生分布、采食利用阶段”逐渐转化进入到了“果用栽培阶段”, 且梅树花开时期的观赏价值已初步被人们所认知。只不过由于当时顾渚山的紫笋茶作为朝廷贡茶无论在其种植规模和经济价值, 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都远胜过当时孤芳自赏的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注定了当时长兴梅的栽植面积和公众关注度不会太大, 还处于山农自种自销的较为原始状态。

因此, 将唐朝作为长兴梅栽培的起源时期, 这一论断具有确凿的科学依据, 值得推崇。据此, 长兴的植梅历史比同为江南地区的杭州西溪(起源于宋代)、苏州邓尉(起源于元代)等地早了500多年之久^[10-11], 长兴因此成为了中国梅栽培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之一。

4 长兴梅栽培的兴盛期

尽管已有唐人植梅在先, 但披检各类文献, 明初以前了无长兴梅的明确记载与品题。然而根据元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以及梅栽培历史的发展规律, 再加之宋元时期与长兴县近邻的苏州邓尉, 杭州西溪、超山, 安吉等地梅的发展情况, 可以推断宋、元是长兴梅栽培的兴盛期, 且基本上以经济种植即采果为主要栽培目的。

根据《长兴县志》记载: “明初洪武五年(1374年)出长兴城, 北行二十公里至水口, 一路左右有古梅数十万株。”从其描述的“数十万株”的规模与气势以及“古梅”二字所透露的梅树树龄信息, 其种植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因此, 把1374年再向上追溯至1274年, 而此时的中国还处在宋朝的南宋时期。

由此可推定, 自唐朝始, 在宋、元时期长兴梅的栽培即已得到了繁衍与发展, 其种植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局部区域已有成片的古树梅林呈现, 梅经济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5 长兴梅栽培的昌盛期

大量的史学文献表明, 明初洪武至清末(1374-1911年)之间的500余年是长兴梅栽培的昌盛期。

首先, 《长兴县志》记载: “明初洪武五年(1374年)出长兴城, 北行二十公里至水口, 一路左右有古梅数十万株。”关于这一具有重要史学研究意义的记载在上文已有论述。

其次, 明朝《吴兴掌故集》载: “安吉之梅溪, 以梅得名, 詎知长兴小浦所出乌梅亦不减梅溪。”^[12-13]由此可见, 在明朝时期长兴盛产的果梅以及由果梅加工而成的零副食品(乌梅)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时至今日, 长兴的乌梅干仍在长兴梅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是国内外著名的农林特产零副食品。在乾隆年间, 每到农历六月, 各地来收购乌梅干的船只可以用“贾船鳞接”来形容。清乾隆《长兴县志》记载有“长兴小浦产梅, 亦不让安吉梅溪。”以及“出吉祥门有梅花墅, 小浦空王教寺有梅花弄。”这些文献信息都反映了明清时期长兴特别是小浦等地梅栽培的繁荣, 其种植规模达数十万株之多, 按800株·hm⁻²计, 面积至少可达125hm², 在当时农业生产资料水平不高的情况, 有其规模实属历史罕见, 梅

经济也成了当时长兴农林经济产业中不可低估的重要支柱。

此外，清代诗人谭肇基以及张诚的诗可佐证，明清时期长兴的梅有昌盛之容。谭肇基《梅花弄诗》云：“合溪溪上梅花弄，清梦依稀不记年，一棹夷犹人图画，蒙蒙香雪嫩寒天。邓尉栖贤休例亲，从前过访记谁曾？”作者在诗词中强烈地表达了长兴小浦合溪梅花弄梅花盛开时“遥看一片白，雪海波千顷”的壮观景象，论极目如海的宏伟景观效果丝毫不亚于龚自珍先生《病梅馆记》中列举的“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这当时三大全国著名赏梅胜地中的任何一处，尤其是“邓尉香雪海”景观。只不过当时长兴梅花弄的梅开香雪盛况由于地理及栽培目的尚未上升到生态旅游开发的高度等原因，而在社会关注度及影响力上有所逊色，大有“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之意，含蓄地衬托出了纯朴、谦逊的一面。

清乾隆年间吴县诗人张诚，在赞叹湖州地区(含长兴)梅栽培盛景时，著有《探梅》诗一首，诗中有将梅栽培形象地比喻成“种植如种谷”之句，足见植梅之盛，呈现出漫山遍野的繁茂景象。

6 长兴梅栽培的衰败期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1911-1949年)是长兴梅栽培的衰败期。长兴梅栽培的兴盛与衰败大致可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相仿，和江南地区诸如苏州、杭州等地梅栽培衰败的原因也几乎如出一辙。究其原因主要有 2 个：①杭嘉湖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全国范围而言，受棉花 *Gossypium hirsutum*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影响，在明清时期，全国的蚕桑业日渐衰败，但在江、浙两省，尤其是江苏的苏州、浙江的杭嘉湖地区例外，反而蒸蒸日上，成了全国蚕桑业和丝绸业的核心地区^[8, 14-15]。在这样的区域经济格局下，长兴与杭州西溪、苏州邓尉等地一样，传统的梅经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蚕桑丝绸发展的牺牲品，部分土地由梅改种了桑树 *Morus alba*。但是，由于长兴的梅产业毕竟具有悠久的栽培传统，在长兴农林经济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山农栽培梅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此次产业结构调整对其影响并不是毁灭性的，梅种植面积较之以前略有所下降。②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破坏。据《长兴县志》记载，在抗战爆发之前长兴梅尚有“二十里地香不断”的繁荣景象。例如 1933 年长兴的果梅年产量为 60.00 万 kg，按年产 50.00 kg·株⁻¹ 计，全县尚有 1.20 万株成年果梅能产果，种植面积约 15 hm²。在当时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且受到蚕桑丝绸业冲击的时代背景下，长兴梅能保留有这一规模已是一个不小的成就。然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爆发，使得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梅产业，更遭重创，例如，据《长兴县志》记载，1948 年长兴梅产业跌至近 6 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谷，单就果梅而言，全年产量仅为 1.75 万 kg，仅约 350 株成年梅树能够产果，种植面积不足 1 hm²。长兴梅的栽培规模退回到了宋元时期水平。

7 长兴梅栽培的转折与发展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里，长兴梅种植面积逐渐恢复扩大，特别是 1978 年以后，长兴的梅产业有了跨越式的发展。1985 年全县梅种植面积达 600 hm²，仅 1987 年就新增 300 hm²，包括花梅、果梅、乌梅、梅醋等在内的梅综合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实现了历史转折，有了“浙江青梅之乡”的誉称，而用果梅烘焙的乌梅干又称“合梅”，在东南亚各国享有盛誉。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长兴梅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00 年受国际国内市场波动的影响，长兴的果梅销售价格一落千丈，从最高时期 4.00 元·kg⁻¹ 降到 0.40 元·kg⁻¹，严重影响了梅农的积极性，强烈的反差以及果梅日常养护成本的不断增加，很多梅农大批地砍伐果梅树，以 0.07 元·kg⁻¹ 的低价当柴火卖，于是长兴的梅产业又再次遇到了寒冬。

与此同时，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狠抓城市生态建设，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迅速，因此，就在长兴梅产业处于冰点之际，以吴晓红为代表的当地企业家看准了被梅农砍伐当柴火烧的老、弱、残梅桩的艺术观赏价值，抓住了将它们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中对丰富冬季景观多样性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机遇，纷纷筹集资金进行收购，并根据国人的爱好，采用高位嫁接将果梅嫁接成更具观赏性的开红花的花梅，由此拉开了长兴梅作为大规模观赏栽培的序幕。

几经努力,长兴花梅已成功地推向了上海、杭州、武汉、南京、合肥、东莞等地,到2007年,全县花梅种植面积达400 hm²,形成了观赏花梅产业,带动了农民致富,在全国知名度不断提高,得到了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陈俊愉教授的高度评价,并于2008年被中国经济林协会评为“中国红梅之乡”。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花梅产业的形成,平衡了果梅市场,果梅价格从2007年开始回升,花梅和果梅实现了良性发展,形成了“姐妹”产业,至此,长兴梅产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8 结语

据史料文献科学论证,长兴梅栽培起源于唐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自唐朝始,在宋元时期长兴梅的栽培有了长足发展,且以栽培果梅为主;明初至清末之间的500余年是长兴梅栽培的昌盛期;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是长兴梅栽培的衰败期;新中国成立后,长兴梅栽培逐渐复苏,包括果梅、花梅、乌梅等在内的梅综合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了“中国红梅之乡”“浙江青梅之乡”的誉称,梅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长兴梅历经千年风雨沧桑,至今仍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其漫长的植梅历史中,已深深地打上了长兴文化的烙印,从它的植物性升华到了语言性,从语言性进而又升华到了它的文化性,成为了长兴文明的象征,在中国梅栽培史、梅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史学地位,是值得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参考文献:

- [1] 谢文柏. 长兴县志[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97 - 874.
- [2] 陈俊愉. 中国梅花[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3 - 10.
- [3] 李庆卫, 陈俊愉, 张启翔.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地下发掘炭化果核的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7, 29 (增刊1): 59 - 61.
LI Qingwei, CHEN Junyu, ZHANG Qixiang. Carbonated stone fruit from underground at Peiligang Historical Site in Xinzheng, Henan Province[J]. *J Beijing For Univ*, 2007, 29 (supp 1): 59 - 61.
- [4] 陈俊愉. 中国梅花品种图志[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9: 2 - 5.
- [5] CHEN Junyu. *Annual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Mei (Prunus mume) Register(2000)* [M].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2001: 1 - 3.
- [6] JING G F, TAL T, ZHEN Z, et al. 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fruiting-mei (*Prunus mume* Sieb. et Zucc.) cultivars evaluated with AFLP and SNP markers[J]. *Genome*, 2006, 49 (10): 1256 - 1264.
- [7] 李庆卫. 梅研究进展[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4, 26 (增刊1): 116 - 118.
LI Qingwei. Advances in Mei (*Prunus mume*) research[J]. *J Beijing For Univ*, 2004, 26 (supp 1): 116 - 118.
- [8] 程杰. 杭州西溪梅花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06 (6): 151 - 163.
CHENG Jie. Study on the plum blossom in Hangzhou Xixi[J]. *Zhejiang Soc Sci*, 2006 (6): 151 - 163.
- [9] 程杰. 论庾岭梅花及其文化意义[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5 (2): 46 - 47.
CHENG Jie. On Mei flowers along Dayu Rid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cultural meaning [J]. *J Beijing For Univ Soc Sci*, 2006, 5 (2): 46 - 47.
- [10] 林雁. 从唐朝的盛衰谈梅花与牡丹[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6 (1): 21 - 28.
LIN Yan. On Mei flower and peony fr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ang Dynasty[J]. *J Beijing For Univ Soc Sci*, 2007, 6 (1): 21 - 28.
- [11] 潘文贤, 钱银才, 朱炜. 浙北果梅桑白蚧发生与防治[J]. 浙江林业科技, 2003, 23 (1): 44 - 46.
PAN Wenxian, QIAN Yincui, ZHU Wei, et al. Occurrence and control of *Pseudaulecaspis pentagona* in the northern Zhejiang[J]. *J Zhejiang For Sci Technol*, 2003, 23 (1): 44 - 46.
- [12] 徐献忠. 吴兴掌故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23 - 45.
- [13] 徐文彬. 安吉县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34 - 57.
- [14] 陆松平, 张韧. 湖州丝绸志[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13 - 24.
- [15] 任振泰. 杭州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53 - 78.